



新时代十年短篇小说创作新变与发展态势

□王 迅

新时代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鲜明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创作特征,主题创作审美更趋自觉,城乡社会变迁的书写突进人物内心,地方化写作浪潮此起彼伏,凸显异质性审美风貌,通俗元素介入文本也激发了短篇小说的文体活力

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就短篇小说而言,创作主体关注中国社会变迁,把脉时代发展大势,反映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新气象、新样态、新格局。

主题创作审美更趋自觉

当代主旋律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多为正面描写,以革命斗争的现实主义描绘凸显历史叙事的崇高与神圣,近十年间出现了一些变化。刘建东《无法完成的画像》把带有神秘色彩的革命活动推到幕后,通过革命画家画师给逝去战友画像过程的细腻描绘,展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凛然气度与丰功伟绩,言此意彼的叙事追求提升了主旋律文学的品格。朱山坡《革命者》中“我”的伯父既是革命者,也搞美术,甚至有些放浪形骸,但他信仰坚定,为保守秘密而创作,显然溢出了传统的革命者形象。迟子建《喝汤的声音》打量封尘历史的海兰泡事件,但很少正面描写惨烈场面,而是借助家族史的视角、喝汤的细节和“牙齿”的隐喻梳理民族创伤史。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写胡老师以自身的历史传承和精神追求,通过生活化的教学实践,塑造着无数幼小的灵魂。“疆二代”与胡老师及“树”构成的审美认知系统,传达了胡老师和胡杨树的生命价值。此类小说在艺术张力中实现了信息密度的增量,以日常化与象征化兼容的艺术表达深化了主旋律叙事。

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乡村新变,主体认知的重塑成为农民书写的新动向。短篇小说越来越关注乡村生态,且从文化主体层面去探究乡村社会命题。田耳《金刚四拿》以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归来者”罗四拿找寻“金刚”的过程,试图对以往城乡二元想象有所超越。罗四拿不为现代都市所接纳,回乡却能左右乡间的生死,缓解乡土的人伦危机。作者既不批判城市文化,也无意为乡土文明代言,而是从文化层面重估生命本体的价值,以生命本体的价值考量实现了对乡土文化灵魂的重塑。同样,汤成难《麦田望不到边》写苏北平原老农马永善与黑团之间默契的日常,展示了农民与土地之间朴素而深厚的情感。现代技术的介入,让老马当了一回电影里的角色,作者以心理波动描写完成了农民主体精神的重塑。

突进人物内心书写城乡变迁是主题创作的另一流派。蔡东《月光下》聚焦于因时间流逝而产生的隔阂。刘亚和小姨李晓娟曾是亲如姐妹的两人,那种特殊的亲密随着时间流逝,却在多年后都市重逢中不见踪影。岁月留下的是生分,是难以言说的心结。这种关系嬗变的书写,是在前现代乡村牧歌式的回溯性叙述中完成的。小说对情感疏远的追问并非是为了批判都市的现代性,而是透出普通人在都市生存的不易、无奈与艰辛。王占黑《去大润发》、朱文颖《分夜钟》、朱辉《七层宝塔》、文珍《咪咪花生》、张惠雯《玫瑰,玫瑰》、宋小词《小宴》、黄咏梅《昙花现》、吴文君《虹》等作品都有内向化的审美追求,力图在日常化叙事中揭开人物内心被遮蔽的隐秘真相。如超大河《浮生一日》等军事题材作品,也从传统的正面战场描写转向主人公世俗日常的叙述,在情感生活的透视中洞悉抗战英雄的内心世界。

地方化书写的兴盛与异质性审美的张扬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边地文学”等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次第出现,这种命名超出了纯粹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合力”作用。邓一光、吴君、盛可以、厚圃等作家的深圳书写特色鲜明,记录了南方都市生活的各个侧面。南翔《伯爵猫》写一个叫伯爵猫的书店即将歇业,举办了颇具仪式感的聚会。作者借助陆工、铁粉老刀及读者的忆旧视角引出故事,弥漫开来的是一幕幕南方生活的场景。在惆怅而温馨的氛围中,作家、诗人、电影导演在叙述中纷纷登场。小说通过都市一隅,对南方日常中的人文气息给予地方化呈现。双雪涛、班宇、郑执等“80后”作家抱着父辈荣辱与共的立场,以子辈视角讲述已成为“过去式”的国企工人下岗故事,同时也有子辈的自我审视。班宇《夜莺湖》就是“厂二代”集体经验的书写,提炼出当代都市青年漂浮迷茫的时代情绪。

龚万莹《夜海皇帝鱼》《鲸路》等鼓浪屿题材小说,以地道的闽南方言来打磨故事,以个性化鲜明的叙事语言介入地方化写作实践。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白色罕达犴》匠心独具地以亡灵视角来讲述生态故事,展开关于草原文化和自然生态的文学想象。兽医阿日坤与同伴到大兴安岭打猎,不幸被困在大雪中,由于一只白色罕达犴的引路而获救。可是同伴意欲捕获这只白犴,结果使之遭受重创。阿日坤为了报恩,救活了白犴。由于人类私欲膨胀无度,偷偷捕杀稀有动物,最终阿日坤还是死于偷猎者手中,暗示了悲剧之因不在“他者”,而在欲望的膨胀。作者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祈愿提出了人类自我重生的命题,有效回应了生态文明议题。次仁罗布《望远镜》写一个边疆少年放弃到城市寻梦的机会,而自愿留守边疆。望远镜作为隐喻,是少年心事延伸的道具,承载着家国与个体互动的情感逻辑。了一容《野菊花》讲述了牧马少年伊斯哈格和少女阿依努尔之间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人性揭示与草原民俗风情描写交相辉映。

雅俗互动彰显短篇小说文体的兼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要“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向创作主体提出了新要求。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常常采用俯视视角,没有贴着读者写,让人喜闻乐见又不至于艺术质地的作品不多。这种情况近十年来发生了变化,不少作家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做出了诸多探索,他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扎根基层,尤其是受到网络文学以及自媒体影响,短篇小说在通俗元素的融入中变得既好看又耐看,显示了短篇小说的弹性空间以及文体优化的可能与趋势。徐则臣《船越走越慢》以侦探外壳写世道人心,写来自亡灵的涓涓暖流在主人公老鳖内心的激荡。作者通过幻觉道出人物的内心密码:妻子以亡灵的形式表达对儿子的牵挂。作者的意图与其说是写辅警老鳖带队抓捕赌团团伙,不如说是以此来侦探自我的内心,追问自我的灵魂。侦探元素在小说中构筑着精神空间,盛放的是已逝母亲对儿子的魂牵梦绕,老鳖对儿子的愧疚之心。叶昕鸣《孔雀》糅合了多种元素,初看起来如同类型小说,但细加品味就能发现,作者把两个残疾人的爱情写得峰回路转,其实意在探讨救赎的命题。

戏剧化的情节设置也成为激活短篇小说文体可读性的重要因素。姚鄂梅《去海南吧》戏剧化地呈现了闺蜜情谊的流变与波折。作者善于在意外的制造中把小说写得峰回路转,主人公陈艺唠唠叨叨地诉苦,让文颖产生陪闺蜜去旅行纯属救场的错觉。用网络流行语来形容,陈艺的倾诉无异于“凡尔赛”,文颖醒悟后欣然拒绝闺蜜的邀请,然而陈艺在旅行中陷入绝境时,文颖又义无反顾地施以救援。闺蜜情谊所发生的戏剧性转折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是当代女性的心灵标本切片。陈世旭《小城故事多》通过文化人的世俗生活片段展现了以老丁的艺术型人格与周光荣的世俗型人格的对峙与反差,以及由此造成的戏剧性效果。小说的魅力在于以诙谐的语言解剖人生,显示了以“轻”击“重”的美学风格。把戏剧化深入到人的灵魂,往往能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写得跌宕起伏,成为故事性写作的另一向度。付秀莹《花喜鹊》写农民工老陈意外捡到一条项链,本想为儿子娶媳妇,但还是觉得有违道德,想把项链还给女主人。于是,他在对与错、是与非之间游移不定,甚至以花喜鹊的邀请与猜测来决定是否将项链归还给女主人。作者不断为女主人寻找抉择的逻辑支撑点,写出了农民内心激荡起伏的曲折过程。农民内心左右冲突的戏剧化演绎,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谱系。

短篇小说艺术探索意识不断强化

应当说,近年短篇小说美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创作主体所追求的并非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开放的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新历史起点上的多样拓展。部分作家把自己对时代的思考,寄托于存在主义哲学思维和现代主义艺术表达,极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

现代审美与古典风格的兼容成为部分作家的短篇艺术追求。东君《夜宴杂谈》没有清晰完整的情节,小说由散碎的谈话拼贴而成,人性的本相在碎片化的叙述中昭然若揭。乔叶《塔拉,塔拉》以散文文化的笔致开启叙述,在旅途见闻式的描绘中萃取隐藏在喧嚣中的人性标本。她的《煮饺子千万不能破》几乎没有情节,而只有对话以及人物的意识流,小说叙述流淌着有关食物的情绪与记忆,温润中见人心。秉持这种叙事追求的作家还有南翔、蔡东、草白等,他们在文体融合上都有自己的领悟和发现。《上海文学》每年开辟“文本探索专号”,推出了系列探索性文本,以媒介之力推动短篇小说文体在艺术形式上探索意识的强化。

逼近自我的存在主义追问成为短篇探索的精神指向,呼应着昆德拉的“存在”诗学。戴来《表态》写主人公“我”在女友、前妻、老头的逼问下被迫表态,而其实,“我”毫无选择空间。胁迫表态的心理需求显示了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危机。老人张贴寻找自己的寻人启事,虽是企图让老伴迷途知返,但显然也是现代人寻找自我的隐喻。晓苏《老婆上树》吸收传统民间叙事资源,以诙谐的语言讲述了女主人公上树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因此落入一种失重的境地。两次上树都是平衡状态的打破,把主人公推向观察者和思考者的位置。邱华栋《河马按摩师》以主人公高光永不停歇的寻找之旅把叙事上升到存在主义之境。陈然《几何学》以两个意象“井”与“镜”来隐喻人类在虚无的凝视中完成自我的审视。小说的叙述穿梭在虚与实之间,从他们的无法确认引向对我自身的质疑。

从主题学上看,短篇小说“正向”思考不断强化,“光明面”得到理直气壮的书写。作为对底层叙事抑郁悲凉审美的反拨,人性的正向书写成为部分作家的选择。哲贵《完美无瑕的生活》直面边缘群体困境,以饱满的激情对世俗生活给予暖色调描绘。单亲家庭是残缺的,不完美的,但父女之间那种亲密关系,几乎可以完全覆盖那失去的母爱。随着女孩的成长,生理和情感上出现父亲无法解决的难题。但父亲借助饲养贵宾犬“奥巴马”消除了女儿的孤独,让萧小荔疏导少女时期的恐惧。父亲与萧小荔是否终成眷属,小说没有交代,却已不言自明。哲贵的叙事给人希望,以温暖的调子重启了向上向善的写作面向。弋舟《光明面》有着同样的思考方向,四面楚歌的破产男子与积极进取的阳光女孩,构成两种精神面向。在两颗心灵的碰撞下,男主人公的情绪状态悄然发生从“阴暗面”向“光明面”的位移。南翔《钟表匠》写两个都市独居老人的日常交往,一次达成彼此的精神互补,终究收获了珍贵的友情。

“题材热”是十年来短篇创作的重要特征,科学幻想、返乡扶贫、乡村振兴等成为短篇小说写作者主要聚焦的题材。《人民文学》2015年第7期推出三篇科幻小说:刘宇昆《人在旅途》、陈楸帆《巴麟》和宝树《坠入黑暗》。他们把人性纳入宇宙星辰与人工智能所构成的科幻体系来进行观察和阐释。正如新世纪以来以“向城求生”为主题的底层叙事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如今农民工返乡潮频频进入公共视野,返乡题材小说成为中国城乡文化心理结构变化的佐证。刘玉栋《回乡记》以返乡者视角发现,城市的人情冷漠出现向着农村蔓延的态势。梁晓声《哥俩好》、姚鄂梅《爸爸的妻子》、余一鸣《地下室》、普玄《生命卡点》、郭文斌《如是我闻》等直面疫情,讲述发生在非常时期的中国故事,既有赞歌也有反思,是“在场化”写作的典型案例。李约热《喜悦》、少一《月光紧追不舍》等小说真实反映了十年来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态以及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成为文学为时代立传的范本。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看,新时代短篇创作担负社会历史使命,近距离观察社会热点问题,表达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人文关怀。

从创作队伍来看,近十年来,有莫言、残雪、苏童、麦家、叶兆言、毕飞宇、韩东等成熟作家不断推出短篇新作,但中青年作家无疑是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写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力作,为文坛注入了生气与活力。同时,一批文学新人正在崛起。三三《晚春》对女性剥掉滤镜后的深刻化透视,杨如寒《大寺终年无雪》对逃避中寻找少女心态的细腻把握,宥予《最好的运气》营造的“爱”与“骗”同行的张力结构,皆以不同的审美气息确证了青年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觉。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学大省,江苏文学批评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汪政、丁晓原、李进、何平等一代代文学批评工作者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为江苏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之省作协及宣传部门的着力培养,尤其是“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项目的实施,让一批更年轻的“80后”批评工作者走上前台。如此齐整的青年文学批评队伍,不禁令人羡慕。

这批年轻的批评工作者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或供职于高校,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或身居作协系统,承担与文学现场高度相关的行政和编辑事务。在工作之余,他们以不同方式投身文学批评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批有思想、有态度、有锐气、有实力的文学青年,不仅是江苏青年批评的中坚力量,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大概正是由于他们在性格禀赋、才情意蕴和工作实际方面的不同,这批年轻的批评者都显现出迥然相异的风格特点,由此也在青年创作高度趋同的今天,极为难得地呈现出批评的丰富和多样。而他们的诸种工作,也顺理成章地引起了我们关于江苏青年文学批评原则、方法和可能性方面的深入思索。

沈杏培无疑是江苏青年批评家的翘楚,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以“新时期小说的历史叙事”和“新世纪小说的现实书写”的论题分别呈现,从他先后出版的《盛宴与废墟》《理性与抒情》《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等专著中,不难领略他独具风格的批评原则和方法。沈杏培一直牢记导师朱晓进教授提出的学术中既要专注“堆堡垒”,又要适时“竖红旗”的建议。近年来,他在“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叙事”方面“深耕细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课题,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强行关联指谬”、灾难文学的叙事伦理,以及李洱小说中的“费边幽灵”等,都是他孜孜以求地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标志性成果。

从高校转入作协工作的何同彬,显然有了更加靠近文学现场的批评优势。这种工作的变动,对于一位极具现场感,以直言不讳的批评“刺客”著称的青年批评者来说,其实再好不过了。在回顾自己的批评工作时,何同彬曾笑言:“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杀手,但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我后来特别推崇的一种批评,就是直言式批评。”所谓直言,即是说真话、说真话,这个说起来容易的概念,在今天的批评界却是极为稀缺的素质。它既要批评者的胆识和锐气,更包含着不凡的知识和才情。不过近年来,我们不再见到他严肃而锐利的文字了。从创作杂志到批评期刊,工作的实际变动让他变得“沉默”了许多,用学生们调侃他的话说,变得越来越“慈祥”了,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意味着一个更加成熟而审慎的“自我”的逐渐形成,带着体恤和温度去对待每一个文本,去重新理解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提到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李玮,我们大概都会惊异于她从鲁迅研究转向网络文学研究后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依托“江苏网络文学研究”课题的契机,一头扎进网络文学领域的李玮来说,作为“Z时代”新思想、新思维、新生活产物的网络文学的蓬勃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然是传统文学难以比拟的。事实上,她的网络文学研究一直有一种立足江苏,放眼世界的眼界和胸怀。如其所言,她开始接触网络文学是因为承接省社科课题,并编撰《江苏新文学史·网络文学卷》。随着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网络文学正在用想象力与创造力持续属于自己的元宇宙,这“既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现场,也是世界文学的中国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网络文学研究和批评就不仅仅是一项“纸上的事业”,而且还能成为一种理性、专业,并具有参与性和对话性的“行业坐标”,其本身恰恰是对大众情感、大众想象、大众经验的“情感性现实”的透彻研究和分析。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以诗歌研究和批评著称的李章斌。在“九叶”诗人研究方面,他力图还原诗人的真实状态,从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关联的角度为其定位,并力图进行一些理论的“去魅”,由此试图挖掘这些诗人写作的“当下性”,而不仅仅把他们视作一串文学“功德簿”上僵死的名字。无论是“九叶”诗人,还是新诗的“音乐性”,抑或当代诗歌的语言与理论问题,都是李章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热闹非凡的当下诗歌批评,李章斌自有其坚守的原则。他时常引用奥登的名言,“批评拙劣的诗人,有害人品”。如果去褒扬一个拙劣的诗人,就意味着扭曲自己的批评尺度,这显然是对个人品质的巨大伤害。因此对于批评,他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诚实”和“定力”,这显然涉及批评层面更高的原则问题。

被何平称为“跨越边境者”或“越境批评家”的叶子,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出身,她一直关注的是“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问题,所展开的文学批评视野也多与此相关。事实上,这里的“越境”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跨越国境的研究者。叶子关注老牌的英语文化刊物《纽约客》,研究这份美国中产阶级杂志所呈现的中国形象问题。这无疑要求她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文学嗅觉,从东西方文化之间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处发现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二跨越学科边界的批评。在以现代文学研究者为主力阵容的当下批评界,叶子跨越学科边界的批评身份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尽管只是以书评和杂谈作为其文学批评的主要呈现方式,但作为安吉拉·卡特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译者,叶子极为自觉地称之为“不确定性”的文学批评,其可能性其实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她的文学之敏、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语言的感染力,也是对今天文学批评弥漫的“论文腔”的及时矫正。

大概是因为供职于江苏作协的原因,韩松刚会不由自主地将批评的对象聚焦在以江苏为锚点的众多“江南作家”身上。如他在《词的黑暗》中所呈现的,无论是范小青、余华、麦家、刘亮程、胡学文等当代重要作家,或是汤成难、孙频、郭爽、项静、三三等活跃的女性写作者,他们都有着大体相似的地域身份。在《当代江南小说论》中,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当代江南小说”概念,显然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延展性。这既是在当代小说发展的框架下探讨特定地域作家作品的文学风格和美学追求的重要契机,又是以地域文学研究为中心对整个江南文化的辐射和考察,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向相对宏阔的区域视野和文化视野迈进的态势。他们在“江南小说”的框架中,对地域文化之下的文学对象展开多维度的考察,详尽分析其形成与发展,意义和局限,这既显现出他出色的理论概括力,又彰显出相对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对于深化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任教于苏州大学的臧晴同样有着极为鲜明的域外视野,她常年关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问题,也时常参与当代女性文学与文化议题的讨论。但臧晴的研究更侧重于问题探讨,而对作家作品的及时批评并不热衷。在她这里,即便是对当下创作的及时跟踪,也力求将其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进行参照比较。因此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臧晴的文学批评包含着清晰的“时间差”,她更习惯于理论和方法上的审慎选择,更侧重围绕作品和现象的嘈杂声音沉淀之后的“再解读”。这类更加学院化的、“慢半拍”的“勘探”工作,无疑有着令批评落入“小心求证”境地的“危险”,也与何同彬所期待的“锐利”和“直言”大相径庭。然而,追溯源头,返回现场,终究是我们探索文学现象内部脉络与文化语境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更加透彻的研究与批评的重要前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发现臧晴批评工作的意义所在。

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之外,年轻的刘阳扬更加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到近些年来蔚为壮观的科幻文学研究上。在她看来,科幻文学不但具有光怪陆离的未来想象,还具有深刻严肃的现实指向,不仅包含对于当下社会的深切体会,也能发现极为微妙的“后人类”景观。在专著《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中,刘阳扬既能深度介入文学现场,“进驻”作为亚文化圈层的科幻世界,同时又能严肃回应五四新文学以来就不断回响的所谓知识分子叙事的重要议题,由此体现出将新潮的科幻小说纳入经典文学史研究序列的勇氣和魄力。这当然也体现出她一直倡导的,将史料梳理和文本批评、“学科化”与“现场感”有机融合的批评方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江苏青年文学批评的原则、方法与可能性

□徐刚

